



一切为了人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

程连升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共陕西省委、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甘肃和陕西交界地区，领导陕甘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经过艰苦斗争创建起来的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先后经历了寺村塬、照金、南梁三个发展阶段。到1935年6月，由陕甘边区和陕北苏区合并而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辖城范围南北500余公里、东西250余公里、总人口超过100万，主力红军达到5000多人，成了当时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开辟，离不开满足农民“平均地权”的渴求。陕甘边区位于偏僻山区，交通不便且土地贫瘠，红军建立之前当地地权不均问题非常严重。如陇东庆阳、华池的“八大家”就控制着两县大部分良田，而陕西淳化、三原、耀县各县土地基本掌握在两三个大地主手里。总体上，能耕种的土地高度集中在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手中，而占90%以上的农民没有土地。面对地主阶级对土地的高度垄断，满足农民的土地渴求就成为开辟革命根据地最有力的政治动员。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建立后，每到一地方，便领导群众开展打土豪、分浮财活动，进行分粮、分地、分牛羊的“三分”斗争，使当地农民群众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从1933年开始，边区领导人深入发

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运动，按照家庭劳动力和人口的混合标准分配土地，优先照顾贫雇农。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借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并结合陕甘边区的具体实际，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土地政策，将地主和富农的牛羊土地一齐分，田地青苗一齐分，指导土地革命的全面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打破了这一地区数千年以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制度，使得广大贫雇农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激发了他们投身革命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为巩固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群众基础。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离不开边区政府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大都处于山大沟深的偏僻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是共同特点。在这种条件下，因地制宜开展经济建设，就成为根据地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还以发展农业生产为重点，以盘活商品交易为桥梁，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为目标，积极组织边区军民开展了各项经济建设。无论是红军经营“公田”以减轻群众负担，兴办“小牧场”和组织“互助合作社”，还是设立集市活跃经济，发行边币支持内外交流，都是苏维埃政府结

合实际情况进行的有益创新，赢得了边区群众真心拥护。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繁荣，有效提高了边区军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有力回击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为根据地发展壮大提供了经济支撑。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辟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是革命胜利的“力量之源”。革命先辈们在艰难困苦战争岁月和革故鼎新的革命实践中铸就“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主要内容的南梁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发展和区域化的体现，也是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成功经验。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贯穿根据地建设始终，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我们提供的重要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始终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设看如何书写民生新答卷

刘宪刚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一切为了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的革命实践，是坚决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昂扬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征程上，深耕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民生事业发展密码，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民生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突出成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陕甘边区封建地主残酷剥削、军阀割据横征暴敛、土匪团相继而起，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立志救民于水火的陕甘边区共产党人，拉开了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曲折序幕，托起了百姓生存底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时，推行民主选举，吸收工农群众参与政权治理，赋予人民政治权利。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废除苛捐杂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制定商业、贸易、粮食等财经政策，设立集市，发行货币，活跃边区经济。发展文教事业，创办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列宁小学、成人扫盲识字班，出版《红色西北》刊物，利用墙报、秦腔等形式，传播革命思想。开展“六劝”活动，推进移风易俗。推广防疫运动，竭力改善边区医疗条件。实施社会救济，对红军家属和孤寡

残疾者优先照顾。

习仲勋说：“我们党的一切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事情。”在全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合并形成的陕甘根据地之所以能够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完整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和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日后又发展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陕甘边区共产党人把百姓看作天，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了权益保障由无到有、与民关系由疏到亲、边区社会由乱到治的转变，赢得了民心、站稳了脚跟、壮大了力量。边区政府的民生事业，极大地促进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推动商业贸易、农业生产、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百花齐放，巩固和发展了新生的红色政权，改善了边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民生建设的现实启示

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总结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民生建设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坚定不移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民生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群众路线是基本途径。坚定的群众路线是陕甘边区星火燎原的重要因素，也是新时代做好民生工作必须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眼睛不离群众，心里装着群众，人民群众就会永远跟党走。

勤政廉洁是必然要求。陕甘边区共产党人廉而不言贫、勤而不道苦，即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也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铁必须自身硬，党的事业关键在人，关键在有一支忠诚无私、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党员干部队伍。

心系人民是关键支撑。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边区干部“逐家逐户访贫农”，到红军战士“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庄严承诺，到“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谆谆嘱托，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共产党人执着的使命和永恒的担当。保障和改善民生，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制度建设是着力重点。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建过程中，坚持把开辟正确道路和制定有效政策相结合，及时把成功的探索经验转化为制度政策确立下来，既维护了边区人民的切身利益，又保障了边区政府的规范运转。先进制度领航民生工程，方能行稳致远，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为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

陕甘边红军部队改造的特点

魏雪莲

陕甘边红军在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一带诞生、发展、壮大。在党的领导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坚持对部队指战员素质进行改善和提升，取得了相当成效。综合来看有如下特点：

一是有毛泽东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导与借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基本上遵循着党领导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后建立革命武装规律。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红四军的发展壮大，毛泽东军队建设思想，尤其是古田会议决议的内容和精神影响逐渐拓展，远在西北的陕甘边红军也受到了影响。阎红彦回忆说：“陕西省委给我们带来了毛泽东同志写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并介绍了江西苏区红军的一套制度，比什么都重要。大家看到这个如何建设革命队伍的文件，高兴极了，就像一把钥匙，使我们的头脑顿时开了窍，决定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红军的建军原则来建设游击队，开始注意纠正部队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以及党内其他许多错误思想。接着就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部队很快持续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无论是在部队的建设方面和群众工作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进展。”

二是部队工农成分增加、政治工作转好与根据地的创建、扩大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长期流动作战会影响红军部队政治教育效果。1932年3月，陕甘游击队各大队设立政治委员，“此后在深山中日天天行军，一切政治教育都感到紊乱而无系统。每日忙于士兵相互间纠纷及其他复杂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收效也很小。”在先后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相继创建并扩大后，红军部队有了进行休整的相对稳定后方，能够正常开展政治工作，有时间与机会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还可以开办学校来培训指战员、培养政治干部，从而进一步开展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随着根据地各种建设的开展及对苏维埃、土地革命的宣传，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参加红军。如，1932年12月，照金根据地的青壮农民和灾民纷纷参军，红二十六军组建步兵二连；1933年12月，红四十二师在淳化、旬邑、正宁帮助三路游击队进行建设，至1934年1月，第二路游击队给红四十二师输送战士200多名，战马70多匹，使骑兵团由2个连扩大为3个连。

三是克服“左”倾错误影响，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初，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中共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者迷信城市中心论，以夺取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为目标，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在根据地内不顾实际强行分配土地，一再反对所谓的“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也正是在这种影响中，从1931年起，刘志丹吸取此前进行兵变的经验教训，走遍陕甘边地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但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谈到哪里，教育和影响着见到的每一个人。正是在刘志丹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尤其是在实际斗争实践中，克服“左”的和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时刻力挽狂澜；尤其是在与中共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边实际相结合，正确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制定政策，独立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得到不断改造的红二十六军不断发展壮大，帮助组建了第二、第三路游击指挥部及众多地方游击队，主力红军发展到2000余人，地方红军发展到2000余人。1935年1月，红二十六军与新组建的红二十七军在陕北会合，连续解放6座县城，形成辽阔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为日后党中央及各路长征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创造了条件。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处长、副研究员

理论
ILUN

● 第二二四七期 ●

理论版投稿邮箱：gsrllb@163.com

电话：0931-8159443

书香甘肃 阅享生活